

129559

无产阶级专政

考茨基著

生活·讀書·新知三联書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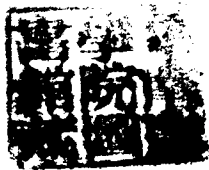
B02
32

129559 ✓

无产阶级专政

考茨基 著

駱靜蘭、彥 劬、柴 紅 譯



生活·讀書·新知三联書店

一九五八年·北京



Karl Kautsky
DIE DIKTATUR DES PROLETARIATS
Wien, 1918

无产阶级专政
〔德〕考茨基著
路静兰、彦 劬、荣 红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北京朝阳门大街320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証出字第56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 850×1168 公厘 $\frac{1}{32}$ · 印张 $2 \frac{7}{8}$ · 字数 (3,000)

1958年7月第1版

1958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15,000 定价 (9) 0.40 元

统一书号 3002·50

校对者：王郁文等



出版說明

卡尔·考茨基（一八五四——一九三八年）和伯恩施坦两人都是第二国际的右翼領袖和理論家。当伯恩施坦发表“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一書时，考茨基曾以“正統派馬克思主义者”的姿态写了“伯恩施坦与社会民主党綱領”（一八九九年）一書，提出某些批評意見。但是，考茨基反对伯恩施坦的态度是动摇的、調和的，特别是在最根本的国家問題上，他仅仅用这样一句話敷衍过去：“关于无产阶级專政任务的問題，我們可以完全安然留給将来去解决。”

德国工人运动中的机会主义領袖們，从拉薩尔到伯恩施坦，都是否認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專政的。馬克思和恩格斯为此曾不断和他們斗争。但是，甚至在經過恩格斯批判后，他們所通过的一八九一年“德国社会民主党爱尔弗特綱領”中，也还是没有把无产阶级專政載入。考茨基在一八九二年发表“爱尔弗特綱領”一書，从理論上把这个綱領加以解释，也沒有提及无产阶级專政的問題。其后他发表过“社会革命”（一九〇二年）、“到政权之路”（一九〇九年）等等小冊子，同样都把这个問題迴避过去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考茨基完全墮落为资产阶级沙文主义的反动立場。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一書中曾經予以申斥，严正地指出考茨基“在关于国家問題上一貫傾向于机会主义”。

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取得胜利，全世界劳动人民莫不欢欣鼓舞，而这位号称博学的“馬克思主义理論家”考茨基，却以

“純粹民主”的卫护者的姿态，发表了“无产阶级专政”这个反动透頂的小册子，极力歌颂资产阶级民主，毀謗无产阶级专政，对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极尽污蔑的能事。到这时候，考茨基的真面目完全暴露，列宁憤怒地斥責他說：“考茨基与反革命的资产者之間实际上已沒有絲毫差別，連一点差别的影子都沒有了”（列宁：“无产阶级革命与叛徒考茨基”）。我們知道：无产阶级专政問題，乃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根本問題。考茨基尽管对于馬克思恩格斯的經典著作背得烂熟，但由于他的自由资产阶级的劣根性，对于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論却無論如何不能接受，到了无产阶级革命时代，这个根本問題再不容他躲避的时候，他就自然而然地滾到反动资产阶级的泥坑里去了。

考茨基並沒有接受列宁的批判，在他以后的一系列著作中（包括一九二七年发表的自詡为集毕生著作之精华的“唯物主义历史觀”），他的反动行为越来越厉害了，他的整套反动的改良主义理論，一直为各国右翼社会党人用来淆乱工人阶级的視听，企图把工人运动引向有利于资产阶级的道路。

毛澤东同志說过：“资产阶级的民主實質上是少数人对大多数劳动人民的专政，而无产阶级专政同时就是大多数劳动人民的民主”（“論人民民主专政”），这个馬克思主义原理，对于觉悟的无产阶级，本来是很容易理解的。但是，披着馬克思主义外衣、矢忠为资产阶级服务的叛徒考茨基，却偏偏要把民主和专政形而上学地对立起来，他所持的論据是，国家在资产阶级民主制之下，性質已經发生变化。他根本抹煞国家的阶级本質，主张工人阶级无須进行无产阶级革命，无須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无須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只要在这种現成的国家机器中就可以保証社会主义的发展。目前，以南斯拉夫鉄托集团为代表的現代修正主义者所鼓吹的，實質上也正是考茨基的这一套。

为了彻底粉碎现代修正主义，有必要把铁托集团修正主义的国家理论的渊源介绍给读者。现在，我们特将考茨基的这本臭名远扬的小册子“无产阶级专政”翻译出版。原书初次于一九一八年冬在维也纳出版，这个译本是根据曼彻斯特英国劳动出版有限公司出版的英译本转译的。

目 次

第一章	問題	1
第二章	民主与夺取政权	2
第三章	民主和无产阶级的成熟	7
第四章	民主的效果	14
第五章	专政	24
第六章	立宪会议与苏维埃	33
第七章	苏维埃共和国	39
第八章	事实教训	49
第九章	专政的产物	57
	(甲) 农业	57
	(乙) 工业	67
第十章	新理论	75

第一章 問 題

現在的俄国革命在历史上头一次使一个社会主义政党成为一个巨大国家的統治者。这是一个远比一八七一年无产阶级取得巴黎的統治更为强大有力的事件。可是，在一个重要方面，巴黎公社却比苏維埃共和国优越。巴黎公社是整个无产阶级的業績。社会主义运动中的一切派別都参加了这一工作，没有一个退出，也没有一个被排除。

相反的，今天統治着俄国的社会主义政党却是以反对其他社会主义政党而取得政权的，它行使着权威，却同时把其他社会主义政党排除于統治机构之外。

社会主义运动中这两派間的对抗，并不是基于微小的个人偏見而产生的，它們的冲突乃是两种根本不同方法的冲突：就是民主的方法和专政的方法。两派抱有同一的目的：即通过社会主义来解放无产阶级，并且随着无产阶级的解放，也解放全人类。可是这一派的想法却被另一派認為是錯誤的，并且是会导致毁灭的。对于象俄国无产阶级斗争这样一个巨大事件，我們是不可能不表示态度的。我們每个人都不能不有强烈的切身之感。尤其是因为我們的俄国同志今天所遇到的問題，明天就会对西欧具有实际的意义；而且这个問題已經严重地影响着我們的宣传和策略的性質了。

可是，在我們周密地考察两方面的論証以前，我們党的責任是不去对俄国内部这一爭执作左右祖。許多同志会阻止我們这样作。他們認為盲目地表示贊同現在掌权的这一派乃是我們的

义务；任何其他态度都会对革命和社会主义本身有害。这就无异于要求我們把那还有待于証明的事情当作已經証明了的事情来接受，也就是說，其中的一派已經发现了正确的道路，我們必須以追隨它作为对它的鼓励。

当然，我們要求充分的討論就表明我們已經是站在民主的立場上了。专政則并不想反駁相反的意見，而只用强力制止那些意見的发表。可見，在討論开始之前，民主和专政这两种方法就已經是不可調和地对立的了。一个要求討論，另一个禁止討論。

好在目前专政还没有統治我們的党；在我們之間仍然是可以自由討論的。我們不仅認為自由发表我們的意見是我們的权利，而且也是我們的义务，因为只有在听到所有的論証之后才可能有一个适当的和圓滿的决定。片面之詞是不足憑信的。兩方面的意見都要听取。

所以我們願意考察一下民主对于无产阶级的意义——我們認為无产阶级专政是怎样解释的——以及无产阶级爭取解放的斗争中，当作一种統治形式的专政制造了一些什么具体情况。

第二章 民主与夺取政权

民主和社会主义——就是生产資料和生产的社會化——的区别是常常这样被划分的，就是，把社会主义說成是我們的目的、我們运动的目标，而民主則仅仅是达到这个目的的手段，有时候这个手段会变成不适当的，甚至于成为一个阻碍。

然而确切地說，社会主义本身并不是我們的目標，我們的目標是消灭各种剝削和压迫，不管这种剝削和压迫是来自一个阶级、一个政党、一个性別，或一个種族的。

我們用支持无产階級的階級斗争来实现这个目标，因为作为最底层的階級的无产階級，不消灭一切剝削和压迫的根源就不可能解放自己；因为在一切被压迫和被剝削的階級之中，工业无产階級是一个在不断增长着力量、战斗能力和繼續斗争的願望的階級，它的最后的胜利是必然的。因此，在今天，每一个真正反对剝削和压迫的人，不管他出身于哪个階級，都必须参加階級斗争。

假如在这个斗争中我們把社会主义的生产方法当作目标，那就是因为在今天流行的技术和經濟条件下，社会主义的生产似乎是达到我們的目的的唯一手段。假如有人能向我們証明我們这样做是錯了，并且有办法証明无产階級和全人类的解放只是在私有财产的基础上就能实现，或者，用普魯东所說的那种方法能够更易于实现的話，那末，我們就摺弃社会主义，而却还絲毫不至于放弃我們的目标，甚至于还是有利于实现这个目标的。因此社会主义和民主不是由于一个是手段一个是目的来区别的。它們都是实现同一目的的手段。它們之間的区别必須从別处来找。社会主义作为解放无产階級的一个手段，沒有民主是不可思議的。

誠然，在民主制度以外的其他制度中，社会生产也是可能的。在原始状态中共产主义的方法却变成了专制的基础，正如当恩格斯在一八七五年研究在印度和俄国一直存在到今天的村社共产主义时所指出的那样。

荷兰在爪哇的殖民政策，在长时期內，在所謂“文明”制度的名义下，把农业生产組織建立在有利于剝削人民的政府的那种土地共产主义的基础之上。

用非民主的組織来进行社会生产的一个最显著的例子，要算十八世紀巴拉圭的教士国家。在那里，作为統治階級的教士，

用专制的权力，但未曾使用武力，就把土著印地安人的劳动組織为一种真正惊人的形式，并且甚至还得到他們的屬民的爱戴。

然而，对于現代人來說，这样一种教权統治会是不可容忍的。这种統治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可能：統治者在知識上远比被統治者优越，而被統治者絕對不能把自己提到与統治者相等的水平。一个为爭取自由而斗争的集团或阶级，不能把这样一种保护制度当作自己的目标，而必須坚决地反对它。

因此，对于我們沒有民主的社会主义是不可思議的。我們理解現代社会主义不仅仅是生产組織的社会化，而且也是社会組織的民主化。这样，在我們看来，社会主义和民主是不可分割地联系着的。沒有民主的社会主义是不存在的。但是要是把这个命題反轉来可就不是同样真实的了。沒有社会主义的民主还是很可能的。甚至于离开了社会主义的純粹民主也是可以想象的，例如，在小农社会中，每个人都有經濟条件上的完全平等，而这种平等是建立在人人都私有生产資料的基础上的。

無論如何，可以說沒有社会主义的民主是可能的，并且民主是先于社会主义而存在的。那些把民主与社会主义看成象手段与目的那样相互关联着的人們头脑中所想的，显然就正是这种先于社会主义的民主，尽管他們很可能急于解釋說，严格地講民主并不真是实现什么目的的手段。这种看法必須着重地加以駁斥，因为，假如它被普遍接受的話，它就会把我們的运动引向最危險的路上去。

为什么說民主会是实现社会主义的不适当的手段呢？

这是一个夺取政权的問題。

有人說，在一个現存的資產阶级的民主国家中，要是社会民主党人在大选中有可能会取得多数的話，那么統治阶级就会利用一切它所能控制的力量来阻止民主的实现。因此說，无产阶级

要取得政权，不是通过民主，而只能是通过政治革命。

无疑的，假如无产阶级在一个民主国家中取得了政权的话，我们必须估计到统治阶级要用暴力来摧毁新兴阶级实现民主的企图。但是这并不能证明民主对于无产阶级丝毫沒有价值。假如在上述的假定下，一个统治阶级采用暴力手段的话，那么它之所以要这样做，恰恰是因为它畏惧民主的后果。它的暴力不是别的，而是民主的消灭。因此，预计到统治阶级摧毁民主的企图，并不足以说明民主对于无产阶级沒有用处，倒是说明无产阶级有竭尽全力保卫民主的必要。当然，假如有人告诉无产阶级，说民主是一种无用的装饰，那么保卫民主所必需的力量就无从产生了。各处的人民群众都很珍爱他们的政治权利，而不肯放弃它。反之，倒是可以设想，他们会用这样巨大的力量来保卫自己的权利，就是，假如敌对方面力图摧毁人民的权利，就会引起政治颠覆。无产阶级对于民主的评价愈高、对其权利的珍爱愈切，则愈能预测这一事态的发展方向。

另一方面，也不应该认为上面预测的不利形势在每个地方都会发生。我們不需要如此气候。国家愈是民主，执行机构，甚至于军事机构所握有的力量便愈是依赖于舆论。假如无产阶级在数量上还弱小，如象在农业国家那样，或者假如由于沒有組織起来并缺乏觉悟，它在政治上也还孱弱的话，即使在一个民主国家中，执行机构和军事机构的这些力量也可以变成压制无产阶级运动的手段。但是假如在一个民主国家中，无产阶级在数量和力量上都增长到足以利用现有的自由来取得政权的话，那么资本家的专政要想调动必要的力量来镇压民主，会是一件巨大的困难工作。

事实上，马克思认为这是可能的，甚或是大概会有的事，即英国和美国的无产阶级可以和平地取得政权。在一八七二年在

海牙召开的第一国际代表大会結束的时候，馬克思在一次会上除了談到別的事以外，曾說：

“将来工人必須夺取政权来建立新的劳动組織。假如他不象过去的基督徒們輕視和否認现实世界的事物那样废弃这些事物的話，那他就必須一反旧制度所采取的旧政策。

“但是我們并不肯定达到这一目的的方法各处都是同样的。

“我們知道，不同的国家的制度、风俗和习惯是必須加以考虑的，有这样的国家如英国、美国以及如果我更好地了解你們的制度的話，我甚至还可以加上荷兰，这些国家的工人可以用和平的方法达到他們的目的。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国家都如此。”

馬克思的預測是否会实现还有待証实。

在上面提到的国家中，确确实实有部分的統治階級，他們想要采取暴力对付无产階級的那种倾向在增长着。但是，除此以外，也还有另外部分的統治階級，无产階級新兴的力量却得到了他們的重視，并且激起了他們想借讓步来取悅于无产階級的願望。虽然在世界大战进行期中，战争严格地束縛了各处群众爭取自由的斗争，但是战争也給英国的无产階級带来了政治权力的巨大的扩张。今天在許多国家还看得出来民主会如何影响无产階級夺取政权的方式，民主会如何使双方避免使用暴力而促成采取和平的方法。无论如何，民主的制度是不会丧失其重要性的。在一个民主共和国里，人民用革命取得的、并且还保持了或扩大了的权利已經确定了几十年，乃至几百年，因而迫使統治階級要尊重群众，在这样的社会里，过渡的形式一定会同那种习惯于用武力統治的、压制人民群众的軍事专制的国家不相同的。

在我們看来，認為在前社会主义阶段，从民主能够影响到无产階級統治的过渡形式而言，民主还不是沒有意义的。我們認為它在这一段期間最为重要，因为它关系无产階級的成熟。

第三章 民主和无产阶级的成熟

社会主义需要那种使它成为可能的和必要的特殊历史条件。这已经是被相当公認的了。但是，假使一个国家已经成熟到可以实现社会主义的时候，究竟需要满足一些什么条件方可促成现代社会主义，这一点在我们之中还决没有一致的看法。在这样一个重要问题上的分歧并不是一种不幸，因为它促使我们来研究当前的问题，这是一件可喜的事。我们不能不考虑这个问题，因为对于我们之中的多数人来说，社会主义已经不是象战争爆发时许多人所告诉我们的那样，要几百年之后才能实现的事了。社会主义已经变成了一个提到日程上来的实践问题了。

那么，建立社会主义的先决条件是什么呢？

凡是人类的有意識的行动都是先有着一个意願的。要实现社会主义的意願就是实现社会主义的第一个条件。

这个意願是由大工业創造出来的。在小生产占优势的社会里，人民群众是生产資料的所有者。即或有那种沒有财产的人，他的理想也是要获得一份小财产。在某些情况下，这种欲望会采取一种革命的方式，可是这样的社会革命是不会具有社会主义的性質的——它只能把現有财富，按照每人分得一份的方法来重行分配。小生产經常产生要維持或取得現行的生产資料的私有制的那种意願，而不能产生对于社会所有制或社会主义的意願。这个意願第一次在群众中出现，是在大規模工业已经很发达，它对小生产的优越性已无可怀疑的时候；这时候，要破坏大規模的工业，即使可能，也会是一种倒退的做法，而大工业中的工人们除非采取一种社会的形式是不能取得一份生产資

料的了；这时候，凡是还存在着的小生产都在逐步地衰落，小生产者已經不再能依靠小生产維持生活了。社会主义意願是在这种情况下增长起来的。

同时，实现社会主义的实际的可能性是随着大工业的增长而增长的。小生产者的数量愈大，他們相互之間愈是分离，要把他們紧密地組織起来就愈是困难。这个困难是随着小生产者数量的减少而相应地消失的，他們之間的关系也是与此相应地密切和团結起来的。最后，随着实现社会主义的意願以及它的物質条件——社会主义的原材料——实现社会主义的力量也就必然产生了。那些要求社会主义的人必定比那些不要社会主义的人更有力量。

这个因素也是由大工业的发展而产生的，大工业使无产者——实现社会主义是他們的利益所在的那些人——的数量增加，而使資本家的数量减少，这是与无产者数量相比而說的减少。而与非无产階級，小农和小資产階級相比，資本家的数量有些时候还会增加。但是在一个国家里面无产階級比任何其他階級都增加得更快。

这些因素是經濟发展的直接結果。它們并不是沒有得到人力的帮助而自己产生的，但它們却不是由于无产階級的帮助，而只是通过資本家所起的作用而产生的，因为資本家的利益就在于大工业的增长。这种发展首先是工业，并且限于城市。农业发展只不过是这种发展的一个微弱的反应。社会主义是会从城市和工业里产生，而不是从农业里产生。因为它的实现除了上面已經述及的因素以外，还需要另一个——第四个——因素。无产階級不仅必須有建立社会主义的兴趣，不仅要有現成的实现社会主义的物質条件和握有利用这些条件的力量；而且还必須有能力保持这些条件并适当地运用它們。只有这样，社会主

义才能实现，成为一种永恒的生产方法。

要使社会主义成为可能，除了条件的成熟和工业发展的必要水平以外，还須加上无产阶级的成熟。然而这个因素不是光靠资本家获取地租、利息和利润的努力，而不要无产阶级自身的努力就能产生的。相反，它必须从无产阶级反对资本家的努力中产生。

在小生产制度之下，没有财产的有两种人。一种人是学徒和农民的子孙，他们缺少财产只是一种暂时的情况。这个阶级的人期望将来会变成财产所有者，并且对于私有财产有兴趣。无财产的这个阶级的另一种人则是流氓无产者，他们是无用的、甚至是有利的社会寄生虫，他们没有教育、没有觉悟、也不团结。遇到自然的机会，他们就会剥夺有产者，但是他们既不要、也不可能建立一个新的社会制度。

资本主义生产方法利用了这一流氓无产阶级，这个阶级的人数在资本主义制度的初期占有颇大的比例。他们从多余的、甚至是危险的寄生虫被转变为不可缺少的生产的经济基础，因而也成为社会的基础了。资本主义增加着他们的数量并扩大着他们的力量，但是资本主义利用了他们的无知、粗鲁和无能。资本主义甚至也力求把工人阶级压到流氓无产者的水平上。由于过度的工作、单调乏味的操劳以及有女工和童工的劳动，资本主义甚至把工人阶级的水平压到过去流氓无产者阶级的水平之下。无产阶级的贫困化增长到一个可惊的程度。

那末，从这里走向社会主义的第一步好象就应该是力争终止那增长着的群众的贫困化。而且似乎这种贫困一定会使无产阶级永远不可能解放自己。资产阶级的同情一定会援救他们，并且促成社会主义实现。

我们很快就可以看出，从这种同情中是得不到什么的。实

現社会主义的足够力量只能期望于那些自己的利益就在于实现社会主义的人，也就是只能期望于无产者们。但是他们不会绝望而死么？

事实上决不是所有的无产者都会死。他们之中有某些部分的人已经显示出向贫困作斗争的力量和勇气。这一小部分人能做那些空想家所不能做的事。

无产阶级用一个突然的袭击就会取得国家政权，并给人们带来社会主义。这是布朗基和魏特林的看法。无产阶级，过于无知和精神沮丧，不能组织和管理自己，应该由那些有文化的高等人物组成的政府来组织和管理他们，就象巴拉圭的教士组织了和管理了印地安人那样。

魏特林预期一种个人的专政，这个人能率领一支胜利的革命队伍来实现社会主义。他把这个人叫做救世主。

“我看到一个佩带宝剑的新救世主来了，来实践基督的教旨。由于他的勇敢，他能作为革命队伍的领袖，并且借助于这支队伍，他能粉碎旧社会制度的腐朽机构，而将眼泪之泉投入遗忘之海，并把人世转变为天堂。”（见“和谐和自由的保证”一书）

好一个勇敢和热情的预见。然而，这仅仅是建立在一支革命的队伍将找到它理想的领导人这一基础上。但是假如不相信会有一个未来的救世主，而相信除非无产阶级能够自己求得解放，社会主义必然只是一个空想呢？

由于无产阶级在其有关的任何组织中还没有获得自治的能力，面对着资本主义造成的工人阶级贫困化，这不是表示社会主义没有希望了吗？

看来好象是如此。但是实践和理论立即指出了一条出路。在英国，产业工人首先开始了一个群众运动，在这个运动中获得了一部分民主权利，发现了进行组织和宣传的一些可能性，并且